

宋元

文史

研究

陈乐素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以上是对本集所刊诸作，略作内容介绍。诸作虽经努力写成，但难免有不少缺点，本文介绍亦难免有概括不当之处，深望读者不吝指正！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1986年10月

目 录

南宋反道学的斗争·····	王 越 (1)
北宋国家的古籍整理印行事业及其历史意义·····	陈乐素 (65)
刘恕与《通鉴》·····	陈乐素 (91)
北宋诗风士风与政治	
——浅谈时君好尚举士措施及党争党禁的影响·····	常绍温 (104)
试论宋太祖朝的用人·····	张其凡 (153)
李清照词的婉约风格与豪放风格·····	陈应潮 (170)
元代西夏人的政治地位·····	汤开建 (189)
元明杨家将杂剧考略·····	杨芷华 (224)
附录：五代宋初禁军之发展	
·····	〔日〕堀 敏一著张其凡译 (270)

南宋反道学的斗争

王 越

“道学”一词见于《大学》：“如切如磋，道学也。”这一句的意义是，“说学习有如切割之后加锉。”这与后代之所谓道学，含义各别。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他们所揭橥的“道”或“道术”，各有其含义或界说，具见于诸子的典籍。而《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韩非子·显学篇》、《史记·太史公自序》，以及《汉书·艺文志》，有的批判异己的学派，有的于评介之中有所侧重，有的撮述各家要旨，探讨其源流演变，均可资参考。

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学”一词的出现，确与道家有关。明代焦竑指出：“吴阊泽对大帝（孙权）曰，至汉景帝以黄子，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勅令朝野，悉讽诵焉。”（《老子翼》卷七附录）这里所谓道学，显然是指道家之学。《太史公自序》述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关于道家他是这样说的：“道家使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为本，以因循为用。…虚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纲也。”这两段话主要是讲君人南面之术，乃是道家之术的重要部分，其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思想，在西汉初年，曾为封建统治者所采用，号称“黄老道。”

东汉末年，农民大起义，皆著黄巾为标志。其首领张角自称贤良师，崇信黄老道。大概因为黄帝是传说中原始社会的首领，而《老子》书中有“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所表现的反苛政的思想，以及“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所表现的平均主义的思想，所以张角等以此思想并利用《太平道》的宗教仪式，团结和组织广大农民，进行武装起义，冲击当时腐朽的反动的封建统治，使东汉王朝受到沉重的打击。为时不久，这个王朝也就在混乱割据中垮掉了。

东汉之后为魏晋，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统治的时代。这个统治阶级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如何晏、王弼以及向秀、郭象等，大抵祖尚《老子》、《庄子》并糅合儒家的《易经》，鼓吹以无为为本，顺应自然，而建立其玄学系统。相沿至东晋、宋、齐、梁、陈诸朝代，大畅玄风。据《陈书·儒林传》，“梁简文在东宫召袁（戚）讲论，又尝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学互相质难”。这儿的“道学”大概是指玄学家。魏晋以来的名流，多数是如鲁迅所指出，“每一个人总有一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不但采作谈资，并且常常做一点注解。唐有三教辩论，后来变成大家打诨，所谓名儒，做几篇伽蓝碑文，也不算什么大事。宋儒道貌岸然，而窃取禅师的语录”〔1〕，此外也有一些头脑较为清醒的思想家，如傅玄、杨泉、裴颢、范缜等，或反对玄风，或批判佛教，在哲学史上作出了贡献。

玄学家被称为“道学”，可见道学与道家之学有密切之关系。毛奇龄指出：“道学本道家学，两汉始之，历代因之，至华山（陈抟）而张大之；而宋人则又死心塌地以依归之；其为非圣学断断如也”。〔2〕这一段话，指出宋代道学之部分渊源，下文

将作进一步考索。

唐代韩愈著《原道》，主张“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意思是说，“仁”与“义”作为两个概念，只儒家才能使用，而“道”与“德”这两个概念则儒与佛、老俱可使用。按照韩愈的看法，儒家之道，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至孟轲一脉相传；可是自轲以后不得其传。韩愈则俨然以接续儒家的道统自命。南宋的朱熹对韩愈有所肯定，但不承认他足以继承儒家的道统。究竟朱熹属意于谁呢？他认为自孟轲以后一千五百多年间，道晦而不明，直至北宋的周敦颐学有所得，才继承了孔孟不传之绪。朱氏甚至赞叹：“幸矣有斯人，浑沌再开辟！”〔3〕程颢、程颐兄弟受学于周敦颐，钻研遗经。朱熹亦认为，到了宋代，文运开泰，于是河南程颢及其弟颐，始得孔孟以来不传之绪，“独其道学之妙，有不可诬者”〔4〕。这就肯定二程是道学之巨擘。

又据吕大临所撰张载《行状》，张载在宋嘉祐初年，会见程颢、程颐于京师，“共语道学之要”〔5〕，在这儿，张与二程所谈的道学究何所指呢？“程子曰，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词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6〕。可见二程之道学即是他们心目中的儒者之学。朱熹是程氏的四传弟子，其所谓道学，也即是自我标榜的儒者之学。至于是否合乎孔孟之道，那是有待评析的。

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南宋时代反道学的斗争。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次斗争的主要对象是朱熹，当时曾掀起轩然大波，其是非功过，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由于朱熹长期处在特殊的历史地位，曾经配享孔庙，所以历来为其辩护者多，但攻之者直斥之为伪学。却也道破了朱熹这个道学家为人和治学之虚伪性的一

面，有助于我们批判封建残余的意识形态。

《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在其《道学崇黜》的标题下，记述了这方面的不少资料，现摘引几段如下：

一、宋孝宗赵昚淳熙五年（公元一一七八年）秘书郎赵彥中疏言：科举之文不应祖性理之说，“洛学饰怪惊愚，士风日敝，人才日偷，望诏执事，使明知圣朝好恶所在，以变士风”。帝从之。

二、淳熙十年御史陈贾上疏请禁道学：“邪正之辩，诚与伪而已矣。表里相副，是之谓诚；言行相违，是之谓伪。……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谨独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夷考其所为，则又大不然。不几于假其名以济其伪者耶！”陈贾主张将道学摈斥不用，皇帝从之。

三、淳熙十五年，林栗弹劾朱熹：本无学术，徒窃张载、程颐之绪余，为浮诞宗主，谓之道学，妄自推尊。所至辄携门人数十人，习为春秋、战国之态，妄希孔、孟历聘之风。绳以治世之法，则乱人之首也。

宁宗赵扩庆元三年（一说二年）监察御史沈继祖奏弹朱熹犯了许多严重的罪恶（详下），吁请宁宗予以罢黜。以韩侂胄为首的反道学集团，弹章屡上，造成“庆元党禁”，打击面甚广（详下），在政治上、学术上引起很大震动。直到朱熹死时（公元一二〇〇年）门徒要举行会葬，也受到禁止。九年以后，韩侂胄等为了安定内部局面，进行抗金，宋宁宗也认识到朱熹在宣扬三纲五常以及“存天理、灭人欲”方面，干了许多理论深化的工作，有利于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于是重新肯定朱熹对宋王朝作出的贡献而予以昭雪，并一再予以褒崇。从此以后，历元、明、清三代，封建统治者不仅尊崇孔孟，而且褒崇朱熹。朱熹的道（理）

学，羽翼孔孟之道，七百多年间，成为积极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官方哲学。韩侂胄既然是“庆元党禁”的缔造者，长期以来，也就往往为卫道者所指摘。

此外，朱熹与陈亮，同时代，通声气，互有友谊，但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彼此却抱有不可调和的观点。朱熹要他“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陈亮则指斥那些讲正心诚意的儒士，麻木不仁（见下）。陈亮卒于宋光宗赵惇时代，与庆元间反道学集团无关。不过，他崇尚功利，坚持抗金，不失为朱熹之诤友。

我们看来，南宋反道学的斗争，为期虽然不长，但探索下去，可发现一系列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从政治上看，朱熹对于宋金和战问题，是否属于骑墙派，从而表现一定程度的虚伪性？二是反道学集团对道学集团的弹劾有何根据？三是作为一个以正心诚意自诩的道（理）学家朱熹，其立身处世是否暴露了一定程度的虚伪性？四是“伪学”之称是否全属诬蔑？五是朱门的学风有何特点？六是明清两代的思想家对“庆元党禁”有何不同的看法？七是对朱熹应如何评价？

—

南宋时代，宋王朝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对金和战问题以及如何对付农民起义的问题。南宋统治阶级一致认为农民起义是盗贼横行，是心腹之患，必须予以镇压。至于对于金朝贵族的继续南侵，究竟如何对付，则显然分为三派：一是以岳飞、张浚、虞允文、陈亮、辛弃疾、韩侂胄等为代表的抗战派；二是以宋高宗赵构、秦桧、汤思退、史弥远等为代表的妥协投降派；三是以朱熹道学集团为代表的骑墙派。宋高宗统治三十六年，对金始终推

行了屈膝称臣，妥协投降的路线。据《宋史》卷三十一，秦桧死后，这个赵构竟恬不知耻地下诏：“讲和之策，断自朕志，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渝定议耶？近者无知之辈，鼓倡浮言，以惑众听，至有伪撰诏命，召用旧臣，抗章公车，妄议边事，朕甚骇之。自今有此，当重置典宪”。在这样的气氛下，虽然有虞允文等抵御金主亮南侵，取得伟大的胜利；朱熹闻捷赋诗，有“明朝灭尽天骄子”之句，但他观察朝廷意旨，不敢昌言乘胜北上，恢复故土，只主张“益修政理”在江南择取守势。

不久，宋孝宗即位，锐志恢复，派张浚出师抗金，由于部将不能协同作战，遭到挫折，孝宗对和战问题，举棋不定。此时，抗战派坚持抗金，朱熹上奏章，论“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7〕认为对金一旦讲和，会使上下离心，中外解体。可是，朱熹对其弟子又说，“秦桧自虏中归，见虏人溺于声色宴安，得之中国者，日夜烂熳，亦有厌兵意，秦得此意遂归来主和，其初亦是矣”。〔8〕由此看来，朱熹又是赞同秦桧而主和的。对照起来朱熹不免自相矛盾。

在上述宋金和议未定之际，宋相汤思退引狼入室，金兵再度南侵，挫败宋军，宋王朝被迫签订耻辱的“隆兴和议”。这时朱熹的论调又有所改变，认为“祖宗之仇，万世臣子之所必报而不忘者”。〔9〕意思是说，复仇一事可寄希望于万世臣子。同时，他又指出“盗贼四起，人心动摇”之可虑。这就突出国内的阶级矛盾而把民族矛盾的严重性，摆在次要的地位。试看他下列一段话：

公试观自古国家倾覆之由，何尝不起于盗贼；盗贼窃发之端，何尝不生于饥饿。赤眉、黄巾、葛荣、黄巢之徒，其已事可见也。…熹恐所忧者，当不在乎流殍，而在于盗贼；

受其害者当不止于官吏，而及于邦家。^{〔10〕}

在这儿朱熹要求当政者必须以全力对付农民起义，这就意味着，“安内”先于“攘外”。我们回顾一下本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反动派的叫嚣与朱熹的呼号，简直如出一辙。

朱熹在宋孝宗淳熙十五年（公元一一八八年）又上了一篇冗长的《戊申封事》^{〔11〕}再三强调人主正心诚意的重要性。同时又提及时人的两种政治主张。一是乐于因循无事；一是要奋发有为，因为“祖宗之积愤不可以不摅，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复”，倘能以此为急务，则人主之心不待劝勉，而自能奋发图强。朱熹认为第一种主张固然不对，第二种主张也是错的。因为“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难保；中原之戎虏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难除也”。依朱熹看来只要人主能够正其心、诚其意，则驱除宿敌，光复故土，都不在话下。如此大言欺人，却暴露了像朱熹这样的道学家，在安邦定国方面，并无善策，只能贩卖那种迂阔而不切实际的“古时丹”，以文其陋。他曾嗟叹，“腐儒空感慨，无策静狼烟”，这倒是较为坦率的自白。

朱熹在对金和战问题的态度方面，为什么动摇不定呢？除了他要适应朝廷意旨，从而暴露出他在这方面的政治主张含有一定的投机性和虚伪性以外，我们还要剖析他的社会历史观是彻头彻尾唯心主义的甚至是神秘主义的历史观。众所周知的是他的历史退化论，把“三代”作为天理流行的盛世，而秦汉以后是人欲横流，“架漏过日”的时代。此外，他所持的历史观足以影响其政治态度的，概括起来还有三点：

（一）气有盛衰说，据《朱子语类》卷百二十七，三十二，三十四有下列几段话：

“气有盛衰，盛时便做得未是，亦不大段□□，真宗时

辽人直至澶州，旋又无事，亦是气正盛。靖康时直弄到这般田地。前汉如此之盛，至光武再兴，亦只得三四分，后来一切扶不起，亦气衰故”。

“某（朱熹自称）小年见上一辈未（敢）说如何个个有气魄，敢担当做事，而今人个个都恁地衰无气魄，也是气运使然”。

“事物久了，自有散坏。秦汉以下，二气五行自是较浑浊，不如太古之精明纯粹。且如中星自尧时至今已自差五十度了。秦汉以下自是散坏，得个光武起，整得略略地，后又不好了。又得个唐太宗，整得略略地，后又不好了，终不能如太古”。

可见朱熹是承继古代“杂占”“星象”“五行”等迷信，胡说国家之盛衰、时势之变化以及人物气魄之有无等等，都是气数或气运使然；这和方士、术士的腔调完全一致。明末清初的颜元对此曾加以批驳：

“宋儒论事，只悬空闲说，不向着实处看。如真宗澶渊之役，是一时将相有人，未经周程欧苏辈禅宗训诂文字坏士习，惑人心，六军还可，高将军还敢呵斥文墨之人。至靖康时，人心风俗坏惑已甚。杨时得罢荆公配享，汤、汪等蒙高宗，使宗汝霖、李伯纪壮志成灰，秦桧竟杀岳忠武，虽寇莱公、高将军复生，乌救灭亡哉！朱子却归之气盛气衰，抑岂知天地之气，人心之气，皆若辈衰之乎？此理不明，乾坤无复振之日矣。”〔12〕

颜元这段话，有些地方说得不那么准确，如“天地之气，由若辈衰之”，这样的措辞未免虚玄。再则，南宋对金妥协投降，杀岳飞，黜其他抗战将领，都出自赵构的私意。秦、汤、汪、黄等

逢迎其意旨，干了大坏事，他们和赵构都是历史的罪人。所谓“蒙高宗”云云，对赵构有怨辞，这是不对的。南宋胡致堂上万言书，直揭赵构不“纠合义师，北向上迎请”被虏的“二帝”，而“亟居尊位”，“斩戮直臣”，大失人心。^{〔13〕}这是对赵构的诛心之论。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亦指斥“高宗忘父兄之怨，忍宗社之羞，屈膝称臣于骄虏而无愧作之色；虐杀功臣，遂其猜防，而无不忍之心；倚任奸人，尽逐患难之亲臣，而无宽假之度”。^{〔14〕}这样的谴责，义正辞严，较符合历史的真相。

但是，颜元指出朱熹只“悬空闲说”，不从人心士气方面说明对敌斗争成败之主要原因；这样的批判却颇为中肯，足以揭露朱熹的历史观之错误。

此外，朱熹也迷信“天命”。绍兴三十一年（公元一一六一年）金主亮统率其主力军南侵。宋虞允文等将领发扬士气，奋勇杀敌，又得到各地的义勇军配合作战，从而挫败金军，取得很大的胜利。金人内部因此发生政变，其统治集团自相残杀。这时正是乘胜北伐、光复故土，解除民族压迫的大好时机，朱熹却认为此次获胜，只是由于“天命”使然：

“窃闻虜酋殒命，种人遁走，淮北遗民，悉降我师，此盖天命眷顾宗庙社稷之灵。廓清中原，以全昇付，莫大之庆，海内同之。然熹之愚虑，独不胜私忧过计。”^{〔15〕}

他的私忧过计是什么呢？第一，假如不是天祐宗室，降罚于金，则此次胜负之数，盖未可知。第二，这次取得胜利，不能归功于诸执政者的庙堂决策，也不应视为群帅攻城野战之功。第三，要乘胜北伐，还返旧京，朝廷之上，还没有人能够担当此任。因此，朱熹主张只应“益修政理，以答扬上天眷顾之命，不宜坐虞邻国之难，以幸为利”。这样迷信天命，抹杀将士功勋，

又反对乘战胜之余威，大举北上，以图恢复。这种态度也是迎合当时赵构反战求和的投降路线的。朱熹虽然说，“胡命须臾兔走林”；但又有两句：“不值亡胡岁、何由复汉疆”。意思是说，必须等待上天有亡金之命，才能恢复失土。道学家的天命观与气运说，名异而实同，其危害性亦同。都是挫折士气、麻痹人民斗争意志的“鸦片”。

（二）中国与“夷狄”各有所恃说：

“中国所恃者德，夷狄所恃者力。…盖以力言之，则彼常强，我常弱，是无时而可胜，不得不和也。以德言之，则振三纲，明五常，正朝廷，励风俗，皆我之所可勉。而彼之所不能者。是乃中国治夷狄之道，而今日所当议也。诚能自励以此，则亦何以讲和为哉？”〔16〕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汉族与其他民族曾发生过许多矛盾和斗争，彼此互有胜负。北宋王朝受到契丹、女真贵族的侵陵，南宋王朝继续受到女真贵族的侵扰，朱熹由鉴古而涉及当代，得出中国恃德、“夷狄”恃力的结论。因此他认为只有昌明三纲五常，提倡德治，才能应付危局。德治从何做起呢，首先要有一个“圣君”。

（三）帝心决定说。朱熹认为国势之盛衰，政治之良窳，社会风俗之醇浇，莫不依人主之心为转移。其理由有二。1.人主之心是天下之大本，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这几句话是君为臣纲的引申，无非要使人相信，君主主宰一切，君心支配一切；只要人主心正，孰敢不正。在进见宋孝宗时，朱熹着重发挥正心诚意这一套，并以远小人（内侍甘昇）为言。

明人李贽曾指出朱熹是如此迂腐而不识时务：

“彼其时为人臣子者，触目激哀，哀号痛恨，不在甘昇

一竖子明矣。吾意先生当必有奇谋秘策，能使宋室再造，免于屈辱，呼吸俄顷，危而安，弱而强，幼学壮行，正其时矣。乃曾不闻嘉谋嘉猷，入告尔后，而直以内侍为言，是为当务之急欤，或者圣人正心诚意之学，直为内侍一身而设，顾不在夫夷狄中国之强弱也，则又何贵于正心诚意为也。”〔17〕

李贽的针砭，可以说是非常中肯。但我们读到朱熹的诗句，“古镜重磨要古方，眼明偏与日争光”。岂不是一个贩卖古方的道学家自鸣得意的情态，又跃然纸上吗？这真是道学家的死症。

2. 正心诚意足以破佛老之虚无和管商之功利。朱熹对当时老、佛及管商的理论都深致不满：

“今议者徒见老佛之高，管商之便，而圣贤所传明善诚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初无新奇可喜之说，遂以为常谈死法而不足学。夫岂知其常谈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仿佛其万分也。”〔18〕

朱熹的所谓妙理活法不外是说，天下之大本，系于人主之心，人主若能正其心，则“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等六事无不正，说来说去，只有正心诚意是万应灵丹，管商虽建功业亦不足道。陈亮于此曾道出相反的意见：

“孔子之称管仲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19〕

这段引语，足使“无策静狼烟”的朱熹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陈亮又对宋孝宗指出：

“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20〕

寥寥几句话，打中要害，使那些以《大学》、《中庸》为敲门砖，空谈心性、无补时艰的大儒，如朱熹之流，原形毕露。朱熹在宋高宗时代，对金主守并赞成秦桧的和议，后来在宋孝宗时代，最初提出“非战无以复仇”之说，坚决反对和议，后来却专门强调人主应正心诚意，而不谈抗战恢复。其主守、主战或主和，甚至大声疾呼强调镇压农民起义的迫切性，置光复故土于不论，如此对和战问题，态度屡变，但变之中却有一条线索。这就是大抵要适应不同时期朝廷的意旨。再则，他对于气数、气运、天命的迷信，使他看不到忠勇将士之可用，更看不到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强大力量（如金占领区义军之纷起抗金）。明明是将士与义军配合共同奋勇杀敌取得胜利（如击败金主亮之役），朱熹竟归之于天命。他对形势如此蒙昧，因此，对于和战问题，动摇不定，最后归于消极，那是无足奇怪的。

颜元对宋代的积弱和程朱道学的流弊，提出过许多尖锐的意见。他所著《朱子语类评》的下列两段是颇有参考价值的：

“一、吾尝言南北二宋人，全无了羞恶之心。又尝言宋儒灭孔子之道，非是宋儒能灭孔子之道，是佛灭孔子之道也。其陷溺邪说只有浅深；浅者遂自见为不染耳。如朱子以不观观之，见龙川（陈亮）、节夫一流人反厌恶，皆是父母为人杀。举心动念不真不热也。故吾尝言晦庵（朱熹）之痛哭沾衿，不如象山之截指习射。二、（宋孝宗）便是为书生误。宋家一代腐气误人，非大豪杰不能脱，脱之者岳鹏举、胡翼之、韩平原（侂胄）三人而已，王荆公受染大半矣。”

颜元有时把北宋和南宋的人一齐骂倒，这是过甚之辞。但他指摘南宋的道学家坐视父母为人杀（即陈亮所谓的“安于君父之仇”），虽有表态却不真不热，而且高谈性命，腐气冲人，其结

果是误国害民。南宋只得几个豪杰，不为所染，然而岳、韩二人终遭陷害，这是可悲的。在这儿颜元不仅不否定韩侂胄，而且称之为大豪杰，与岳飞相提并论。主要是因为韩坚决抗金，虽败犹荣。平情论之，韩侂胄出兵北伐，由于用人不当，军事上的准备不足，又出现了内奸，招致“开禧”之败，他负有一定的责任，但其抗战的决心却无可非议。宋朝廷函韩首以求和，简直是荒谬的。

二

朱熹是道学家中的代表人物，弟子黄干（又是女婿）为他作《行状》，对他的治学、修身、齐家、睦邻、作宦和掌教极口称誉，视为“自洙泗以还，博文约礼两极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这就是说，朱熹的道德学问超越孟轲荀卿，其余儒家诸子更不在话下。根据黄干的描述，“其为学也，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终也。……终日俨然端坐一室，讨论典训，未尝少辍。……存此心于斋庄静一之中，穷此理于学问思辨之际，……然充其知而见于行者，未尝不反之于身也。”究竟如何“反之于身”呢？“其可见之行，则修诸身者，其色庄，其言厉，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行于家者，奉亲极其孝，抚下极其慈，闺庭之间，内外斩斩。……于乡闾……周恤问遗，恩无所阙。……若其措诸事业，则诸县之设施，立朝之言论，经纶规划，正大宏伟，亦可概见。……先生教人，以大学语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其于读书也，又必使之……玩其辞，求其义。……然为已务实，辨别义利，毋自欺，其谨独之戒，未尝不三致意焉；盖亦欲学者穷理反身而持之以敬

也”。〔21〕

从上述的行状看来，似乎一个体现致知穷理、正心诚意的朱熹，其举止言行，处世接物，作宦治民以及静居讲学，都足为当世楷模，后代典范。另一个朱熹崇拜者竟说，“周东迁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运升降之会，天必拟大圣大贤以当之者，三纲五常之道所寄也。”这就是说，朱熹有如孔子，都是应天命而出世的特殊人物，有了这两位圣贤，三纲五常才能维系下去。对“圣贤”如此顶礼膜拜，这代表了卫道之士的意见。但是，朱熹这个偶像，就在南宋时期，誉之者固然很多，毁之者亦不少。我们必须合而观之，加以分析比较，别其真伪，判其曲直，才能避免片面性。

朱熹本人对于社会的毁誉，政治上的荣辱，仕宦的得失，本来有一套看法。他认为作为君子，必须实践“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古训。对横逆之来，要处之泰然；世俗是非毁誉，何足挂齿牙间。他甚至说，“若使见得此道理重，便斩作万段，亦须向前，岂容复有顾虑耶。近年道学外而被俗人攻击，里而被吾党作坏”。〔22〕态度如此坚决，俨然是殉道者的气概。因此，他对于前人如韩愈、苏轼处逆境的表现，颇为不满：

“韩退之著书立言，抵排佛老，不遗余力，然读其谢潮州表，答孟简书及张籍侑奠之词，则其处于祸福死生之际，有愧于异学之流者多矣，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宜哉！”〔23〕

“东坡在湖州被逮时，面无人色，两足俱软，几不能行；求入与家人诀，而使者不听。…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此夫子所以有取于虞人，而孟子亦发明之。…愚谓若果识得此意，则无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权势威力，亦